

編者引言

黃俊傑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

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的前身係光復前的台北帝國大學，創立於 1928 年，至 1998 年正好屆滿創校七十週年。¹孔子(551-479B.C.)自述他的生命的歷程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七十年不僅是個人學思歷程臻於成熟之年，就一所大學的發展而言，七十年也是可觀的時間。本校創校七十週年時，正值世紀之交，人類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新紀元前夕。為了紀念創校七十週年，並在世紀之交省思台灣的文化發展，本校在民國 87(1998)年 10 月 22-23 日舉辦《跨世紀臺灣的文化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外關心台灣的文化發展的學者以及本校師生及畢業校友，共襄盛舉。這部書就是當時在研討會上發表

¹ 關於台灣大學校史的初步研究看：黃得時，〈從台北帝國大學設立到國立台灣大學現狀〉，《台灣文獻》第 26-27 卷 41 期(1976)，頁 224-245；吳密察，〈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發展看台北帝國大學的設立〉，收入：氏著，《台灣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歐素瑛，〈光復期的國立台灣大學(民國 34-38 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24 期(1998 年 6 月)，頁 51-90。

的部分論文，其餘部分論文因種種原因而未能收入本書之中，但我在這篇引言中將會介紹他們的意見，我想在此先向所有撰寫論文的作者、評論者以及出席者，敬致深切的謝意。

二、

在這篇引言起首之際，我想首先說明本校籌備這項學術研討會時的一些構想，以作為讀者的參考。

臺灣的歷史與文化源遠流長，內涵豐富，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但是，在日益興盛的「台灣研究」領域裡，相對於經濟、社會、政治等議題而言，台灣的文化發展較少受到重視。最近所出版關於戰後台灣的研究論著，雖已注意到台灣的文化，但或側重戰後台灣文化中「大傳統」與「小傳統」的變遷；²或僅及戰後台灣的教育、藝術、儒學等，³均屬回顧性質之研究。從較為宏觀的角度來看，我們思考台灣的文化發展，至少牽涉三個視野：(1)從台灣看台灣；(2)從中國大陸看台灣；(3)從世界看台灣。第一立場可以建立臺灣史研究的「臺灣主體性」；第二立場則較能掌握作為「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的台灣之歷史的發展之特質；⁴第三個觀點可以充分體認臺灣作為一個所

² Stevan Harrell and chun-chieh Huang eds, *Cultural Change in Postwar Taiwa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³ Chun-chieh Huang et.al.eds., *Postwar Taiwa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llege Park: University Press of Maryland, 1998)

⁴ 參看：陳紹馨，〈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台灣〉，收入：氏著，《台灣的人

謂「世界島」，是以一個近代世界東西各國經濟及文化交流的中心點，而在近代世界史佔一席之地。⁵這項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與會中的討論，基本上都環繞著台灣的文化發展這三個不同層面而進行，所以這部書的編輯除了《導論》兩篇論文之外，所收的文字也分成三個環節：1.從台灣看台灣的文化發展，尤其側重傳統與現代價值在台灣之激盪；2.在台灣與大陸互動的脈絡中，思考台灣的文化發展；3.在台灣與近代世界互動的脈絡中，思考台灣的文化發展。本書所收的十一篇論文，就依照以上之三個層次加以安排。

我想首先介紹《導論》所收兩篇文字的主要論旨。許倬雲先生的文章〈台灣文化發展的軌跡〉，是為研討會論文所撰的總結文字，他首先指出「文化」一詞涵義的廣袤與文化系統的整體性與複雜性，以作為我們思考臺灣的文化發展的起點。接著，許先生指出台灣的文化內涵以常民文化最為源遠流長根基深厚，他說：

綜合的說，台灣的幾個疊壓的文化層，最底層的原居民諸層，只在現存的幾個原居民族群中可以找到；最深厚而持

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頁 1-8。陳紹馨的觀點近年來受到許多學者的批判，例如徐正光就強調台灣研究應建立台灣的主體性，也就是站在台灣本土的立場，釐清台灣與中國社會與文化的關係，並以世界史的眼光來重新瞭解台灣。見：徐正光，〈一個研究典範的形成與變遷：陳紹馨「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台灣」一文的重探〉，《中國社會學刊》15 期 (1991 年 12 月)，頁 29-40。

⁵ 曹永和對這個觀點頗有發揮，參看：曹永和，〈荷蘭與西班牙佔據時期的台灣〉，收入：氏著，《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頁 25-44。

久的一層是中國常民文化；日本文化層在一批特定的少數人口中有其不可磨滅的影響，對於廣大的台灣社會基層，卻未必有深入的滲透。中國近代文化層中的「士大夫」成份，在台灣也不具深入滲透的影響。西方文化層則因為台灣社會經濟的重大變化，竟與中國近代文化層與日本近代文化層頗有銜接滲透的趨勢。總之，台灣的中國常民文化層，源遠流長，根深柢固，其上層的後來文化層，層層疊壓，卻不外是局部的，或是薄薄覆蓋一層而已。這一常民文化層基礎，長期保持厚實。

但是，台灣的常民文化卻又潛藏著中國文化的精神，並受日本文化某種程度的影響，許先生接著強調，台灣的文化基盤是中國常民文化，其中滲透浸潤了中國文化的精萃。中國文化的仁道，包含「忠」「恕」兩目，日本文化借了中國文化的「忠」字，發展而成爲武士道，與忠於職務會社倫理。日本文化沒有發揮中國的「恕」字，以致不斷闖下侵略的滔天大禍。許先生盼望，在學術界進行思辯工作時，常存「恕」字在心，或能循此途徑，營造思辯的良好氣氛，庶幾可能平實地建構一個新文化。⁶

⁶ 許先生對台灣文化發展的看法與李亦園先生的觀點可以互相發明，李亦園近日指出：「台灣原有主流的漢族文化，無可諱言的是中華文化的一支，對中華文化的大傳統而言，台灣文化是其中的一個區域文化，也就是小傳統的文化。然而，在半世紀的發展中，因爲世界潮流的推動，以及內部所產生的動力，原來較偏重常民生活的台灣小傳統文化，當然也努力要形成爲一個具有大傳統性質的文化，因此大小傳統之間就會產生互相激盪，這也許就是李總統要提倡「新中原」文化的本意。另外一方面，在今日資訊發達，全球化日益快速的情勢下，如何適應採擇

本書第一篇論文作者余英時先生，則從一個更為寬廣的視野討論文化發展問題。他首先指出，無論就整個世界而言，或專就一個地區或國家而言，我們都不能離開關於文化價值「普遍說」(universalism)和「殊異說」(particularism)這一概念，而討論文化發展的問題。接著，他回顧國際學術界關於「文化」問題的研究，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後，「普遍」基本上壓倒了「殊異」；七十年代以後，特別是最近一、二十年來，則顯然「殊異」壓倒了「普遍」，西方思想主流中的自由主義者現在放棄了以西方為座標的普遍文化價值論，他們也開始承認不同文明、不同族群都有保持他們文化「殊異」的權利，但他們仍要在大大小小的諸「殊異」文化之間尋求「普遍性」的共同價值。這種共同價值不再是西方所獨有的，而是來自不同文化之間的最大公約數。余先生在上述的思想背景下展望臺灣跨世紀的文化前景，他指出，我們有一切理由保持樂觀，尤其是自解嚴以來十多年的民主化進程，使我們深信文化「殊異」與「普遍」之間是可以取得一種動態的平衡的。一個世紀關於東西文化的種種爭論已從社會實踐中取得初步的答案，無論轉型時期暴露出多少不滿人意的地方，一個最重大的關口畢竟渡過了。余先生最後從光復初期本校傅斯年(1896-1950)校長提倡「用多元主義代替主觀主義」的精神中指出：

國際性開拓性的現代文化，卻又能保存自己文化的特色，也是一個不易抉擇取捨的重要問題，所以探討台灣當前文化的發展，就是以這兩個問題最為根本。」見：李亦園，〈這時代臺灣文化發展的觀察〉，《媒體、社會和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壢：國立中央大學，1999年4月25日），引文見頁51。

台灣大學確是一個「有容乃大」的大學。文化一元是「包容」的反面，固不必說。但文化多元則絕對離不開一個「容」字。「容」的主體不是任何個人，而是大學制度的本身。一個有「容」的大學制度才能為學術的多元化提供繼續發展的可能。反過來說，學術的多元化也不斷擴大大學制度的「容」量。「普遍」與「殊異」之間的動態平衡在台灣大學的校史上恰好獲得了具體而微的實證。

余先生所強調「普遍」與「殊異」之間獲得動態的平衡，不僅是他對台大的期許與祝福，也是二十一世紀台灣的文化發展的重要方向。

三、

現在我想就本書所收錄各篇文字以及與會學者在研討會現場所表達的看法略加綜述。論文作者及與會者的思考方向及主要見解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第一個角度是從台灣內部的角度來思考台灣的文化，如戴景賢從台灣社會基本特質來看這個問題；江宜樺講戰後到現在這五十年來台灣民主意識的變遷；徐宗懋講戰後的教育，特別扣緊政權和文化的關係；孫大川以原住民學者的立場，講原住民的言說歷史在漢人強勢的書寫歷史之下被忽略的狀況；來自美國的周克勤講台灣官方儒學與國民黨政權的關係。

第二個角度則是扣緊台灣與大陸以及台灣與世界交光互影之處思考台灣的文化問題，如黃俊傑所談的華人的國家認同問題，經由歷史解釋而塑造，台灣官方、大陸官方以及台灣的台獨人士

的國家論述皆是如此；石之瑜講民族主義與全球化在台灣的發展；李弘祺講從現代化到全球化；陳昭瑛講二十年代台灣的知識分子從啓蒙到解放的轉變過程，並且指出當時台灣的知識分子是對全世界開放、對傳統保持審慎的態度；宋光宇比較二十世紀海峽兩岸的宗教，他指出台灣的寺廟是活著的，而大陸的寺廟在 1949 年後則是死的，被當作文物來處理的；廖咸浩分析七十年代以後台灣的鄉土文學運動中的文化政治，他感覺到從九四年以後的幾波全國和解，都有一種「去中國化」的意圖；呂正惠思考台灣文化未來究竟應該脫亞入歐，還是回到中華民族立場；張隆溪講二十一世紀台灣應該在保持中華文化優點的立場上向世界開放等等。

接著，本書所收的論文以及研討會當時全場討論所觸及的重要問題，可以歸納為五個重要的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文化的普遍性與殊異性的動態平衡問題。余英時在主題演講中呼籲文化的動態平衡是可能的，也就是說在「普遍」(universalism)和「殊異」(particularism)之間是可能獲得平衡的。他引用台灣大學光復以後的第一任校長傅斯年「有容乃大」的口號來期許本校。在演講後的討論所涉及的問題裡，如殊異的文化或族群並立的新時代中，日趨重要的所謂「肯認政治」(politics of cognition)和「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在二十一世紀必然日益受到重視。

第二個大的學術性議題是全球化與本土化的互動問題。李弘祺、石之瑜、張隆溪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這個問題，而這個問題也是台灣目前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在《科技、產業與跨世紀台灣的文化發展》座談會中，李家同談到我們必須注意全球化潮流中

弱勢文化消逝的問題。許倬雲談到世界文化與地區文化價值之間互動的問題，都是涉及到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的互動。

第三個議題則是「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重疊與緊張的問題。涉及這個領域的論文包括黃俊傑、陳昭瑛、廖咸浩的論文。陳昭瑛的論文間接地觸及當前台灣的「政治認同」(political identity)與「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兩者間複雜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是植根於台灣歷史的深刻主題，那就是台灣和中原間的離心力與向心力的拉鋸戰關係。從鄭成功到兩蔣以至於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議題植根於台灣歷史之中是如此深刻，以至於牽動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的發展。

第四個議題是「我」與「他者」之間的「游移性」(discursivity)問題。從各篇論文討論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所謂「我」與「他者」(「他者」就台灣人來講是外省人；就原住民來講是漢人，包括台灣人、外省人；就台灣整體來講是大陸)之間有一個游移性，這大概是從各篇論文以及學者發言裡可以給我們的啓示。這種「游移性」又可以從 intra 和 inter 的觀點來看。從台灣內部觀點來看，許多論文和討論過程告訴我們：所謂「台灣人」和「外省人」的身分認同有其游移性存在，隨著時移事異外省人也被台灣化了。石之瑜的報告相當感性，他引用許多詩詞說明這一點。這種游移性也表現在原住民與漢人間的問題。孫大川也講到「山地平地化」是不對的政策。他從原住民的觀點來講，認為不管是本省人或外省人所建立的政府，都是外來政權。他這樣的論點很具有啓發性。另外「臺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之間也有游移性，中國時報副總主筆徐宗懋在他的口頭發言時指出，自認為是

「台灣人」或「中國人」的認同意識，會隨著很多立即而短暫的事件而有所變化，例如千島湖事件等等對認同意識都有直接的影響。薛承泰在評論的時候甚至提出一種說法，他認為就是「統」和「獨」之間也有一種游移性。

再從台灣與大陸，或台灣與大陸、世界的互動脈絡來看也有一種「游移性」存在。香港中文大學郭少棠教授指出這種游移性裡的香港因素。他提到香港的邊陲性隨著九七以後而日趨顯著，他也提到台灣之淡出香港的問題，他呼籲大家重視香港作為海峽兩岸的中介的重要性。在討論的時候，他的評論者就提到邊陲之作為中心，也就是告訴我們在 inter 觀點下的「我」與「他者」間的移動問題。

第五個問題是科技、產業與文化的平衡問題。座談會主持人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以及八位演講人儘管所講的內容各有不同，有的具體、有的抽象，但他們都涉及為什麼、是什麼以及如何達到「平衡」的問題。李弘祺在他的發言時說，這八位引言人都希望從前瞻的觀點解決現在的問題。李遠哲呼籲人文學者應該勇於面對前瞻問題的挑戰。本校副校長陳正宏討論時，提出在高等教育裡面人文與科技如何平衡的問題。師大的同學提出教育領域的自主性如何獲得，以及教育領域及非教育領域如何平衡的問題。這些問題在座談引言人雄辯滔滔的言論裡都獲得深入的討論。舉例言之，李家同感嘆全球化過程中弱勢文化逐漸消逝，他建議台灣大學注重兩個研究方向：一個是人類的經濟問題，例如金融的無政府狀態、環境污染所帶來永續經營是否可能的問題；第二個是人類的基本倫理問題，他鼓勵台灣大學應該有產生新文化的

共識。曹興誠講資訊電子產業的優勢是在於垂直分工而不是水平分工，甚至也不是如亞洲許多飽受金融風暴困擾的國家或地區的垂直分工的問題。辜成允講到的非經濟性因素已經在台灣對經濟發展造成愈大的影響，這些都涉及「如何」的問題。

許倬雲在總結報告時把他們八位座談會引言人的思考提升到更高的層次上。許先生特別強調兩點：第一、他認為這不只是個「平衡」的問題，而是一個「融合」的問題，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第二、他說「融合」應視為一個思辯的過程，而大學就是一個思辯最好的地方。他說，思辯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

以上所綜述的是這部書的基本內容以及研討會重點，以作為讀者閱讀本書的參考。最後，讓我引用朱子(1130-1200)的詩作為這篇引言的結語：「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讓我們共同期許這個永無止境的思辯過程，成為二十一世紀國立台灣大學學術發展的源頭活水。(1999年5月18日)